

傳統儒學的普世論立場 與現代的特殊論解釋⁺

任劍濤^{*}



在儒學普世論（universalism）與特殊論（particularism）的解釋中，前者的解釋重要性得到了歷史證實和現實推動。

儒學普世論的失落

傳統儒學對普世論立場的從容表達，構成前現代時期儒學表達自己的基本價值立場與現實政治主張的趨同方式。這種表達的構成要點由下述幾個方面構成，其一，作為價值表達者的「人」的定位，不是特殊的社會歷史處境中的、具體的人，而是超越歷史與社會限制的、大寫的「人」。其二，傳統儒學呈現了一個從類同的家庭倫理到普世的社會政治倫理的理論建構進路，儒家並沒有將這種論說限定在族群政治、歷史文化、具體處境的範圍內。其三，

傳統儒學建構了一個普世的道德境界遞進的進路，「三綱八目」呈現的是普世的德性境界和德行項目。其四，傳統儒學對道德修養功夫的強調，也不是對個人一己的獨特的道德認知與道德修養的論述，而是對一切進入道德領域的個體的普世方式的敘述。但是，在現代處境下，傳統儒學的這種普世論主張明顯失落。現代儒家幾乎總是從特殊主義的進路申述儒家的價值立場和基本主張。這是一種顯見的傳統儒學與現代儒學的緊張。

儒學特殊論的型塑

在現代新儒學家體認「花果飄零」的歷史處境中，儒學解釋具有一種極其明顯的悲情傾向。而這種悲情儒學註定了一種似乎是普遍主

⁺ 本文係二〇一〇年十月六日本院儒學討論會內容。

^{*}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系教授。

義其實是特殊主義的思維定勢，亦即中國文化語境中的思想家們《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書》的典型表達方式。這種思維定勢預制了後起的儒家對於儒家進行闡釋工作的基本方向。而國外的儒學研究者，如撰寫《中國的自由傳統》的狄百瑞（De Barry）、《超越自由民主》的貝淡寧（Daniel Bell）等對「中國的」儒學限定性的傾慕，也明顯體現出特殊主義的解釋偏好。

特殊主義儒學的表達定勢：「中國的」絕對前置詞、「歷史的」合理性描述、「可能的」現實性作用、「邏輯的」哲理性論證。

特殊主義儒學的陷阱

普世論的傳統儒學是古代中國的國家意識形態。它具有強大的理論更新活力、現實的政治引導實力。特殊論的現代儒學是現代中國的邊緣化理論建構，它缺乏自治的理論建構和現實的引導能量。在某種意義上，面對現代的「抵抗的」儒學或「批判的」儒學，都是儒學自毀前程。真正試圖重建儒學的理論力量和實踐針對、現實效力，必須對特殊主義儒學可能墜入的陷阱有所認知：首先，偏離儒家精神；其次，脫離儒家軌制；再次，固化儒學困境；又次，增強西學優勢；最後，扭曲現實指引。

重歸普世儒學

作別儒學的特殊主義闡釋進路，回歸儒學的普世主義立場，已經構成儒學當代重建的關鍵問題。這對儒學的當代發展來講，涉及幾個關乎其生死的重大問題：一方面關乎儒學的現代思想創造活力問題；另一方面關乎儒學對人的現實引力重塑問題；再一方面關乎扭轉儒學疏離政治現實的困局問題；最後則關係到儒學當代現實效用的顯現問題。